



黄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萧致治

摘要：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受过近 20 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批判创新。辛亥革命前后，他对传统文化的陈旧落后部分有不少批评。辛亥革命后，他第一个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忠、孝等传统道德作了新的阐释。他是弘扬和履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

关键词：传统文化；黄兴；批判与继承

孔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黄兴在青少年时代，长期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以及诸子百家思想，对孔子和诸子百家的言论思想有系统的学习和理解。同时，他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对妨碍革命的落后甚至反动的旧文化多有批评，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则积极主张继承和弘扬。他自己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履行者，被誉为具有良好道德操守的民族伟人。

一、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黄兴在其父亲黄炳坤的直接教授下，五岁发蒙，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孔子的言论集——《论语》。到了七岁，黄兴已经读完《大学》、《中庸》、《孟子》等所谓《四书》。八九岁时，拜举人萧荣爵为师，又读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所谓《五经》，并聆听了萧举人讲解《论语》等儒家经典，还学会吟诗和作对联。此后，在翰林周笠樵家又进一步学习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义理之学，还读了不少诸子百家著作以及唐诗宋词，学会撰写时文。再后，从 1893 年到 1897 年，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五年，学习的仍然主要是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他还写得一手刚柔相济、遒劲有力的好字。人们赞扬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①。

1898 年至 1902 年，黄兴入新旧学结合的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亲自为该院制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方针指导下，新学与旧学并举，学习内容虽然有些变化，而核心内容仍然未离开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可以说，他从 5 岁至 28 岁去日本留学，始终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教育。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民主革命家。在这方面，他和孙中山有很大不同。孙中山在 13 岁之前，只读过几年私塾，13 岁随母亲去檀香山后，接受的完全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教育。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中国，经历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传统文化，内容虽然丰富多彩，同时却又十分庞杂。其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载《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61 页。

中既多精华,也有大量糟粕。黄兴对于陈旧传统文化的批判,首先把矛头指向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长期祸害中国人民的君主专制制度。自从秦汉以来,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利,千方百计美化这种统治制度,鼓吹“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把君主统治制度中的君权,美化成受命于天,自称为“天子”,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大众只能顺从,不得反抗,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黄兴对这种文化思想采取彻底否定态度。他说:“中国数千年来专制为政,至社会成一种不平之阶级,贵贱悬殊,人民受害无穷。”^①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以君主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以少数人之自私自利,而剥夺大多数人之幸福。其施行这种政策,不过欲达‘朕即国家’之目的,毫无利国福民之意。”^②对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君主专制,其抨击尤其猛烈。他认为,清朝专制统治不但祸害中国两百多年,而且闭关锁国,招致外国侵略,将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他说:“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日蹙百里;内恣行其专制,政以贿成,驯至国势阽危,有如累卵。”^③他认为:“专制政体,弊窦繁兴,讳疾养痈,决不能却弊求存。吾国非痛加改革,创建共和,俾全国人民共负责任,无以立于世界之场。”^④由此认定:“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⑤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受压迫最深,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所谓“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等,都是捆绑妇女的锁链。黄兴对妇女长期以来所受压迫深表同情,积极倡导男女平等。他说:“女子同胞,从前不但受国家压制,并受男子压制,实在苦不可言。今日国体改良,我女子同胞趁此机会,二千年来所遗传之苦恼从此可以铲除,与男子同享共和幸福。”^⑦为了束缚妇女手脚,唐宋以来,妇女盛行裹足,自小把两脚缠得很紧,不让自由发展,形成所谓“三寸金莲”,认为这样最美。对于这种缠足陋俗,黄兴深恶痛绝,竭力主张革除。他认为“裹足实阻碍文明之进化”,“缠足之害,有过吸烟(指鸦片),亦当严行禁令”^⑧。辛亥革命后,妇女逐渐解放,积极要求参政议政,黄兴积极赞成。他明确表示:“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成问题。”为了实现男女平等,他还积极倡导发展女子教育。他说:“中国人数四百兆,女界占二百兆,先要达到教育平等的目的,然后可达政治平等的目的。即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久就要成了。”^⑨

不良的社会风尚,关系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影响及于全社会。对此,黄兴对于清除社会的不良习俗,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曾指出:“社会上不良之点极多,皆是(足)为民国障碍物。故解决现在之社会问题,莫如从风俗上着手。”^⑩他说:“中国习俗恶染甚多,如食洋烟,喜缠足,不明公德,不讲卫生之类,志士呼号已数十年,至今尚未能痛改。”^⑪崇拜神灵、迷信风水等类封建迷信,长期是束缚人们思想的一副沉重思想枷锁。对此,黄兴也主张坚决革除。他曾说过:“湖南最信木偶(按:俗称菩萨),以为可以捍患御灾。不知古人神道教设,所以令人处处有敬畏之心,使其天良不丧。后世不察,以为可以医疾。不知医生不好,尚能杀人;木偶何灵,安足延寿!……又有风水之说,谓父母死后须得佳城,则灵验常存,后世子孙方能发达。夫父母之有灵验,必其生前作有大事业,足以感召后人。如岳武穆今犹有灵,非其躯壳有灵,因其义烈凛然千古,犹有生气,精神事业足以感人之故也。乃后世不察,致因图谋风水,构讼耗钱,且将父母遗骸连年搁置不葬。今且在矿山铁道,阻碍文明进化,此迷信之亟宜革除也。”^⑫

三、对传统文化的创新阐释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开始在中国建立。这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解放,同时思想显

① 黄兴:《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6页。

② 黄兴:《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727~728页。

③ 黄兴:《在旅沪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答谢词》,载《黄兴集》(二),第464页。

④ 黄兴:《致袁世凯电》,载《黄兴集》(二),第483页。

⑤ 黄兴:《在前清皇族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481页。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⑦ 黄兴:《在北京湖南女界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500页。

⑧ 黄兴:《在湖南普通全体大会上的演说》,载《黄兴集》(二),第553页。

⑨ 黄兴:《在北京女界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495页。

⑩ 黄兴:《在北京正乐育化会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512页。

⑪ 黄兴:《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载《黄兴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

⑫ 黄兴:《在湖南普通全体大会上的演说》,载《黄兴集》(二),第553~554页。

得十分紊乱，原来的社会习俗，被一些人不分是非一律否定。不少年轻人在政治革命、家庭革命的口号下，误解自由和民主。有的“假自由不遵法度，借平等以凌文化”^①；有的则把“背父离母，认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②。由此导致“以孝悌忠信为戒”，“以礼义廉耻为病”，“政令不行，伦理荡尽”^③。黄兴眼见这些紊乱现象，“五内焦灼”，认为是一种严重社会危机，即便“猛兽洪水之害，实无逾此”^④。有鉴于这些严重的不良现象，时任南京留守的黄兴一方面致电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教育部长蔡元培等人，提请注意纠正；另一方面致电各省都督，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作了新的阐释，要求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师，向学生讲明这些新义，“毋使邪说横行，致令我神明胄裔误入歧途。保国保种，惟此是赖。”^⑤

为了弘扬传统的优秀伦理道德，使之在建设民主共和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黄兴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了富有创意的新阐释。自从秦汉以来，在君权至上的专制统治下，一些御用文人对忠孝仁义等传统伦理道德作了服务于君权统治的曲解，使其蜕变成成为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以致认为“忠”就是忠于君，“孝”就只孝于亲。造成曲解的根源在于“学说庞杂，道化凌夷。君主私其国家，个人私其亲族。大盗窃国，奸夫有家”。最后酿成“胡虏僭位，称为圣明”，完全丧失了“忠”“孝”的本义。黄兴强调，不破除这些迷信，即“无以尊重人道”。之所以造成种种弊端，“非误于国民之崇尚忠孝，而误于国民不明忠孝之真理”^⑥。为此，他对忠孝的真义作了透辟的解说。他说：“我中华开化最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立国之要素，即为法治之精神。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⑦以这次反清革命来说：“全体一心，父诏兄勉，前仆后继，复九世之深仇，貽五族以幸福，于民国则为忠，于私家则为孝。是以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诸学说，原为改良政教起见，初非有悖于忠孝之大原。”^⑧同年11月，他在长沙周南女校的演说中又说：“凡做事能着实做去即谓之忠。古人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即此可谓忠孝之确解。”^⑨黄兴这些解说，力辟谬误，既符合原义，又令人耳目一新。把尽职谓之忠，变“忠君”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各人所从事的事业，这与忠于君不啻有天渊之别。把“立身”谓之孝，号召大家注重修身敬业，正确待人接物，不只局限于孝敬父母，这更大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巩固民主共和新国家。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的演讲中，也提出要恢复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比如说：“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号召要“忠于国、忠于民”，“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⑩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和黄兴完全一致，但比黄兴要晚提12年。

可是，自从民国成立，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了解忠孝的真义，对忠孝仁义、信义和平之类的传统美德，一概加以背弃，“少年在学校则不师其师，在家庭则不亲其亲。似此行之个人则无道德，行之天下则无秩序。发端甚微，遗祸甚大”^⑪。此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严重注意，防微杜渐。所以，黄兴致电北京中央政府及各省都督，要求各级学校及时加以纠正，乃是十分英明的决断。他对当时上海成立昌明礼教社“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己任”深表赞成，肯定他们“深明匹夫有责之义，是宣布共和以来所日夕望而不图得之者也”。他认为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导以从违，酿成善良风俗”^⑫，社会必将走上正轨，国家也将兴旺发达。

① 黄兴：《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载《黄兴集》（一），第374页。

②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载《黄兴集》（一），第370页。

③ 黄兴：《致各都督电》，载《黄兴集》（一），第372页。

④ 黄兴：《致各都督电》，载《黄兴集》（一），第372页。

⑤ 黄兴：《致各都督电》，载《黄兴集》（一），第372页。

⑥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载《黄兴集》（一），第370页。

⑦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载《黄兴集》（一），第370页。

⑧ 黄兴：《致袁世凯等电》，载《黄兴集》（一），第370页。

⑨ 黄兴：《在周南女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载《黄兴集》（二），第572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247页。

⑪ 黄兴：《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载《黄兴集》（一），第374页。

⑫ 黄兴：《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载《黄兴集》（一），第374页。

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履行弘扬

黄兴“无我”的胸怀,“笃实”的作风,“宽厚”的品德,一向为人所敬仰。这些优良品德,无不与优秀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罗家伦在为《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书作序时,盛赞他“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①。这是十分中肯的。黄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根柢深厚,而且特别重视身体力行。在这方面,他称得上是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

首先,以忠来说,他是真心实意、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心为国为民的真诚爱国者。他很有才华,文章写得很好。如果沿着“读书做官”的旧文人道路走下去,相信他会官运亨通。一生荣华富贵,不在话下。可是,他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之际,为了救国救民,却毅然舍弃了这条个人升官发财之路,弃文习武,百折不挠地走上反清革命、前途充满艰险的救亡之路。为了救亡图存,他舍小家、顾国家,把祖宗遗下的三百石田产和房屋一起卖掉,用来充作革命经费;为了救亡图存,他不顾自身生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愈挫愈奋,不达救国目的,决不止息,为救国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了救国救民,他不但献出了自身的一切,而且把自己尚未成年的长子一欧也献给革命。1906年,黄一欧刚满14岁,他就嘱他填写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誓约》,由孙中山和章太炎担任介绍人,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②。1911年11月21日,他正在烽火连天的汉阳前线指挥作战,寄给正在参与攻打南京的一欧的信,竟然只有八个字:“努力杀敌!一欧爱儿。”^③他自己为了革命不顾生死,还嘱咐儿子也要不顾一切,“努力杀敌”,这是一种何等虔诚的爱国情操啊!

他一生立论行事,一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因此,他不但真诚爱国,而且处处关怀民众疾苦。1912年9月18日,他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强调:“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今政治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放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④同年11月15日,他在湘潭各界欢迎会上再次重申:“此次革命,乃为同胞谋自由幸福。世界不平等之事极多,而其最不平等者莫如贫富阶级。贫者为牛马,而富者为主人翁。此事非极谋改革以求平等不可。”^⑤他不但这样说,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处处顾及民众疾苦。即如1912年初,将政权让给袁世凯,除了其它因素之外,不忍民众继续遭受战争之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来他在美洲国民党支部答复质询时就说:“当时何以不直抵北京,作黄龙之痛饮?只以当时袁氏戴假面具赞成共和,吾人以革命之目的已达,加以吾党以人道自持,不忍再动干戈,至人民涂炭,故让总统于袁氏耳。”^⑥“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放弃“拼死一战”的初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儒家的仁爱之心。当时他曾私下向日本驻南京的秋元海军少佐吐露了这个心情。他对秋元说:“现在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有各种障碍,南京无法维持。牺牲在这里,是男子汉大丈夫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我部下的将校都反对我的做法。如果我一定坚持我的意见,是使这些有为之士徒死于此地。这又是不忍心的。更何况无辜良民破产弃家!”^⑦临行时他还嘱咐留守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要维持南京秩序,不要让残留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⑧。从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黄兴以仁慈为怀,对民众的疾苦是何等关心!

再从孝悌来说,他在处理家庭关系上,也是孝慈为怀,不离传统文化的本色。他的生母去世早,继母易自如只比他大16岁。但黄兴对她言听计从,侍奉她有如亲生母亲。家中一切事情,都是由易自如做主,黄兴一切听从安排。他因国事繁忙,写的家书不多,留下来的更少。但从仅存的少量家书来看,黄兴对待家人可谓情真意切,温情脉脉。他的如夫人徐宗汉,原来育有一女一子,分别名叫李雄(若鸿)、李强(应强)。他待之如同己生。比如1915年他在美国养病时,收到李雄等从日本寄去的信。黄兴的回信中

①罗家伦:《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序言,载《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第18页。

②毛注青:《黄兴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第167页。

③黄兴:《示黄一欧书》,载《黄兴集》(一),第144页。

④黄兴:《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501页。

⑤黄兴:《在湘潭普通全体欢迎会上的讲话》,载《黄兴集》(二),第578页。

⑥黄兴:《在美洲中国国民党支部召开“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711页。

⑦片仓芳和:《二次革命与黄兴流亡日本》,载《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⑧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210页。

就体现了情真意切的爱儿情感。信中说：“雄、强两儿如吻：前接来函，我以病余，未即答汝，甚为怅念！闻汝等学课均好，来函文句清顺，字体韶秀可爱，若能再加工学去，将来雄儿定可得女学士头衔无疑，强亦当如阿姐之用功，则自然有进境。美弟现长得甚好，日日要写信与哥、姐。英语亦学得几句，齿音清楚，旨意亦明，又是汝等之难弟矣！阿奶身体颇好，毋念！专心读书为嘱。”^①

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和为贵”。黄兴在继承与发扬“和为贵”方面做得特别突出。他以“无争”原则来待人接物，注重与人的和睦相处和团结别人。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讲述了一段亲身的体会。他说：“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②黄兴竭力维护革命党人内部的团结，自然首先是由于谨记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教训，而与“和为贵”的信念也有密切关系。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总的来说善始善终，但也有过两次冲突。衡情论理，在这两次冲突中，孙中山不对的地方居多。可是，黄兴为党为大局，都主动作了有利于团结的让步。早年的国旗旗式之争，本来可以从长计议，然而孙中山竟然大动肝火，弄得令人无法忍受，致使黄兴十分不快，气愤地表示要退出同盟会。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主动作了让步。表示“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指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③这应该是受过传统道德教育的深远影响，才能“委曲求全”。后来在加入中华革命党问题上，孙中山要求入党人宣誓和盖手指印，无条件地服从他一人干革命，完全违背了近代民主原则。黄兴一再提出忠告，孙中山执意不从。为此，黄兴只得一方面坚持原则，拒绝加入；另一方面赴美暂避，以免彼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为了竭力维持与孙中山的友好关系，临别前夕，还请孙叙别。到美国后，对人仍然说“领袖唯中山”，对彼此之间的分歧不发一言，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黄兴这种宽宏大量的处世风度，和儒家的忠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和为贵”的思想，还被黄兴运用到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上。民国成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期。但当时国内民族分裂倾向十分严重。黄兴为了国内民族团结，及时提出了民族平等联合主张。他认为民族联合必须以民族平等作为基础，“以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进化为目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皆是兄弟，无上下等级之分。他主张铲除“藩属”之类的旧称呼，贯彻民族平等精神，“南北一家，兄弟一堂，虽二十二行省，虽蒙古、西藏，通是兄弟一堂也”。他还强调提出：“中华民国之成立，非一二人之力，乃五族同胞大家出力赞助而成。现在中国外患紧迫，我们五族弟兄同心同德，大家负起责任来，方能巩固共和，得享自由幸福。”^④中国历代的大同思想，为黄兴预设了美好的理想。无国界，无种界，全人类平等相处，共享人生欢乐，是他的最高理想境界。所以，他在提倡民族平等联合时，把为促进民族联合而建立的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其最终目标是：希望“爱国英贤，识时巨子，共矢宏愿，大扩初基，俾我四亿同胞，携手而偕登乐利，与彼五洲强国，联袂而永享和平”^⑤。他还期望“将来民国不但五族平等，必与各国之种族平等，与各国之宗教平等，成一大同之世界”^⑥！这又是何等宽大而崇高的胸怀啊！

黄兴作为杰出革命家，不但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也有许多真知灼见，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身体力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堪为楷模。

● 作者简介：萧致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黄 兴：《致李雄李强书》，载《黄兴集》（二），第 775 页。

②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149 页。

③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第 114 页。

④ 黄 兴：《在北京回教俱进会欢迎会上的演讲》，载《黄兴集》（二），第 496 页。

⑤ 黄 兴：《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载《黄兴集》（一），第 261 页。

⑥ 黄 兴：《在湖南圣公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载《黄兴集》（二），第 547 页。